



一九八六年

第一辑

(总第13辑)

编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
委员会办公室

印刷

齐市铁路印刷厂

2	刀丛愤读 抗敌救国 ——记一九四一年“一二·三〇” 事件前后在齐市的秘密活动 和监狱生活……………徐 明
42	“一二·三〇”事件后 一段遭遇的回忆……………陈 克
45	回忆齐市读书小组的活动 ——给徐明同志的一封信……………左念武
47	敌特朱冠军是怎样 钻进新京组织的? ……………崔黎夫
49	于无声处听惊雷 ——记苏联远东红旗军齐齐 哈尔地下军事情报站……………傅瑞云
封二	“读书会”历史照片三帧
封三	“忠灵塔”·工人文化宫……………常立人
封底	齐齐哈尔工人文化宫(照片)



一九八六年
第一辑
(总第13辑)

编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办公室
印刷
齐市铁路印刷厂

2	刀丛愤读 抗敌救国 ——记一九四一年“一二·三〇” 事件前后在齐市的秘密活动 和监狱生活……………徐 明
42	“一二·三〇”事件后 一段遭遇的回忆……………陈 克
45	回忆齐市读书小组的活动 ——给徐明同志的一封信……………左念武
47	敌特朱冠军是怎样 钻进新京组织的? ……………崔黎夫
49	于无声处听惊雷 ——记苏联远东红旗军齐齐 哈尔地下军事情报站……………傅瑞云
封二	“读书会”历史照片三帧
封三	“忠灵塔”·工人文化宫……………常立人
封底	齐齐哈尔工人文化宫(照片)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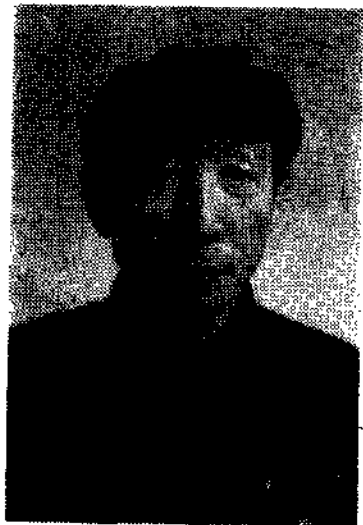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开始了。在这种情势下，1931年被日寇吞占了的我国东北地区，就变成了侵略者的极其重要的后方战略基地。在我国东北这块土地上，日寇加强了对中国同胞的法西斯奴役统治，对我东北丰富的物资更加紧了疯狂的掠夺。

在这种民族处于空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东北知识青年的思想不能不发生空前剧烈的动荡变化。他们为了求生存和救危亡，毅然挺身而出，同残暴的敌人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浴血战斗。1941年的“12·30事件”，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12·30事件”是1941年12月30日在哈尔滨发生的。这次事件是日伪反动统治当局对东北抗日爱国青年有计划进行的一次空前大镇压和血腥大屠杀。以这次事件为契机，日伪警宪特务机关对东北爱国青年的镇压浪潮，遍及东北各地区、各角落和各个高等院校。

在这次事件中，仅据敌伪档案材料记载，被逮捕的东北反满抗日爱国青年达355人之多，被判刑的达170人。同时，由于敌人实行疯狂的株连政策，沾边就捕，斩草除根，在这次大逮捕浪潮中，究竟直接和间接地逮捕和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很难做出精确的统计。

现在，这个事件已过去四十四年了，今年正是这个事件的四十五周年纪念。这次事件中虎口余生的人，有的人已经与世长辞了，现在还活着的人大都已年逾花甲。为了使这页东北爱国青年反抗日本侵略者而斗争的历史，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为了使后代青年继承和发扬那一代爱国青年为祖国独立而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在我国社会



刀丛愤读 抗敌救国

——记一九四一年「一二·三〇」事件
前后在齐市的秘密活动和监狱生活

徐明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中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想，把亲身经历的那段同敌人浴血斗争的历史记载下来，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在搜集材料过程中，有关这一事件的历史当事人陈克、李季若、左念武、崔黎夫和刘凤卓等同志，都曾提供了很珍贵的回忆材料。

一、一所军营式的学校

1938年2月，我们考入“新京（长春）财务职员养成所”学习。这个所位于长春南岭，所址是一座两层四字型的红砖楼，四周很宽阔，门前是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的草地广场。南面岭下，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

这个所直属伪满经济部，当时由伪满经济部大臣韩云阶担任所长，它的任务是为敌伪培养和训练中级税务、海关和专卖等专业人员。入学学员全部是高中或国高学校毕业生，相当于大专学校。学习时间为一年半，毕业后由伪经济部向东北各地实行统一分配。

这是一所完全军事化的学校。一切学习费用都是公费。在物质待遇方面，实际上是按日伪军官待遇，比较优厚。冬季发给黄呢制服、军用大衣、皮帽、毛毯和被套等，夏季发给毛哔叽制服和日常劳动服装，每月还发给一定数量的津贴费。但日常学习生活纪律却极其严格，不得违反。学生完全按军队编制，全期学员分成四个区队和十六个小队，实行严格军事管理，甚至每天起床和就寝都要列队点名，由日本教官逐队检阅，不得稍有松懈。教师大部是日本人，由日伪高级财税人员任讲师，由日军退役的炮兵大尉松下担任全所学监，负责全体学员的思想训练任务。每星期六下午，由松下学监亲自进行“精神训话”，对全体学员实行严格的思想管制。

日常饮食由日本饭头包伙，每餐定时定

量供应，完全是日本式的酱汤和菜饭，有时食不果腹。饭前，要全体起立和敬礼，感谢日本天皇陛下的“皇恩浩荡”。

二、幻想与追求

我是该所第二期学员，全期同学共有一百六十人，按日语程度分为四个学习班。我初入学时，日语水平不高，分在第三班。我考入这个所的学习动机，是幻想为下一步去日留学深造准备条件。

在入学初期，我的追求目标是：学好专业课并使日语彻底过关。为此，我把主要精力全部用在提高日语水平方面，不久就通过了日语考试，从第三班升到第二班，并先后担任了小队长和区队长。这些职务都是由日语较好的同学轮流担任，以便能对日本教官直接用日语做报告。这样，就更增加了我的学习信心。

当时，我对于能进入这样一个公费学校来学习是心满意足的。我家住在内蒙突泉县，这是一个极其偏僻的县城，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全县也只有一所中学校，至于高中、大专和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在全县也不过两、三个人。我从这个偏僻县城考入奉天（沈阳）商科高中，又由商高考入“财职”，自己也感到很得意，但我并不想以此为满足，还希望能实现梦寐以求的去日本留学的理想。

由于很多同学都是一直过着学生生活，长期接受日伪当局的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很少接触社会，更很少看到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残暴统治的一面，因而把自己关在个人奋斗的狭窄圈子里，思想发展受到很大局限性，甚至把日本看成是个人奋斗的理想王国。

三、一个重要的思想转折点

在学习期间，我逐步熟悉了一部分同期

同学，其中主要有陈树满、陈作师、齐九皋、董春荣、王宪国和张士斌等人。特别是二陈对我影响较大。由于他们对社会阅历较深，对外联系面较广，思想也比较活跃，他们很喜爱文学，常写些诗和文艺作品在当时《文化日报》和《新青年》上发表。我们常常相互借阅一些文艺小说看，有时漫谈对作品的读后感想，这些对我都有很多启发和帮助。

在这期间，我们在新京东四道街旧书摊上，结识了一位旧书贩史全兴。他在旧书摊上虽然摆着各种剑侠小说，但在箱子里却藏着鲁迅、茅盾、巴金和丁玲等人的文学作品。我们从他那里，经常可以买到当时禁阅的当代中国文学名著和翻译的苏联革命文学作品。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此，我开始对阅读文学作品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喜欢和这些同学们接近了。在课余时，大家经常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畅谈个人对前途和社会的思想感受，发泄对日本人实行严格思想控制的不满情绪。在不知不觉中，在第二期同学中开始形成了一个秘密传阅进步书刊的小集团，它在同学中越来越大地发挥着思想影响作用。

这期间，在我们部分同学中秘密传阅的书刊主要有鲁迅的《呐喊》、《彷徨》、《华盖集》、《随感录》，茅盾的《子夜》、《虹》、《腐蚀》，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还有郭沫若、丁玲、郁达夫和萧军等人的小说集等。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主要有：《铁流》、《夜未央》、《门槛》、《狱中记》、《死魂灵》、《克鲁泡特金自传》、《猎人日记》、《母亲》、《我的童年》、《父与子》、《贵族之家》、《前夜》……等等。

在这段时间里，从这些思想清新、内容

丰富和充满革命激情的文学作品里，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突然又接触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急剧地转移了我们的学习注意力。我们逐渐把日语和专业课以及留学日本的幻想都丢到了一边，开始如饥似渴地埋头阅读这些闪着奇异思想光彩的国内外文学巨著。到后来，日本教师的讲课，也充耳不闻了，你讲你的，我看我的。这是我们一部分同学在那个特殊历史条件下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由于这些进步书刊在我们部分同学中已引起了深刻共鸣和广泛影响，适应大家渴望加强联系、探讨问题和交流思想的要求，我们经常利用星期天或课余时间，到南岭崖下和南湖边上，认真思考和讨论一些涉及民族和国家前途的一些问题：祖国的抗日战争前途究竟怎样？东北的漫漫长夜何时破晓？我们这些青年将向何处去？是为人做牛马，还是奋起抗争？等等。

通过阅读书刊和秘密讨论，在我们部分同学中日益迸发出激愤的火花，不断启发和提高了民族觉悟和热爱祖国的情绪。它象一条无形的思想纽带把这一部分同学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

四、敌人也在为自己培养掘墓人

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敌伪长期实行反动统治的年代中，虽然他们一方面为自己训练出某些驯服工具和忠实爪牙；但在同时，也为他们自己培养了一批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掘墓人。由日本人一手创办的新京财务职员养成所，同样也不例外。

在当时，全所学员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日系学员”（日本学员），一部分是“满系学员”（中国学员）。日伪教育当局不许我们称自己是中国学员，而只能称是“满系学员”。所内日本学监更对这两部分学员实行差别对待，分室授教，分批就餐，

分屋就寝。相形之下，“日系学员”处处受到优待，饮食异常丰盛，而“满系学员”则处处低人一等，汤菜不足，有时还吃不饱。再加上包伙的日本饭头从中克扣，饭菜质量是每况愈下。这使同学们很感气愤，一致向所方要求改善伙食，实行平等待遇，但所方不仅无动于衷，还认为“满系学员思想有问题”，提出严厉警告和训斥。这使同学们进一步认识到所谓“日满一德一心”的虚伪本质。

与此同时，中日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由于所方不断向日本学生进行“大和民族优越”、“日本人在满洲负有神圣使命”等等帝国主义思想教育，使日本学生更加盛气凌人，对中国学生公然表现出鄙视情绪。在夏天傍晚，他们赤膊登上楼顶，仰天吼叫，鬼哭狼嚎，表示他们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征服一切”和“无所畏惧”的武士道精神。

有一次，日本学生宿舍失盗，他们公然声称“小偷向满系学员宿舍的方向逃去”，暗示这是“满系学员”干的。这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学生的自尊心，使大家义愤填膺。日本食堂服务员也欺侮中国学生引起同学反抗，从此更使两者关系急剧恶化。日本学生公开扬言说：“满洲人如果都像满系学员这样，满洲国的安全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中日学生这种严重对立的情况，在日伪档案（沈阳铁路公安处保存日伪档案资料《一二·三〇事件的概貌》，下同）中也有记载：“因训练所对日、满系学生的待遇差别很大，并且日系学生经常以傲慢的态度对待满系学生，故在整个满系学生中间弥漫着不满的气氛”。

五、松下学监的“精神训话”

在日常生活中，每到星期六下午，日本松下学监都照例要进行一次“精神训话”。

年近半百的松下学监，身材矮矮，鼻子底下留有一撮小黑胡，神态冷峻，不苟言笑，声音洪亮，一副日本武士道嘴脸。据说，这位退役的炮兵大尉，曾经指挥过一个炮兵分队，在华北将整片整片中国村庄夷为平地，为此而受到“嘉奖”并获得“军功章”。每到节日，他就把这枚“军功章”佩戴在胸前，向同学们夸耀。但同学心里都很清楚：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松下学监的“精神训话”，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两小时，中间休息十分钟，然后再讲，又是两小时。什么“大日本帝国的赫赫军威，所向无敌，皇军圣战必胜”啦，什么“大日本天皇的皇恩浩荡，圣德无疆，万世一系，普照万邦”啦，什么“日满两国的血缘关系”、“日满是亲邦，日本是根，满洲是叶，根深才能叶茂”、“日满只有一德一心，共存共荣，五族协和，才能共同携手前进”，等等。他要求同学“一定不要辜负养成所的栽培，成为满系人里的中坚力量，为建设王道乐土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松下学监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有这些声嘶力竭的“精神训话”，不是加强了“日满一德一心”，而是不断加深了同学们日益增长的对日不满、敌视和反抗情绪，他是正在亲手培养他们的日益觉醒的掘墓人！

在这段学习中，还有一位使同学们念念不忘的给我们讲授财政学的章教授。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南方人，讲一口南方话。他对待同学，关怀倍至，情同父子。每到饭后，他就和同学们到南岭广场散步。他孜孜不倦地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把眼光放远，要有远大理想；说青年人要胸怀广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章教授的讲话，很发人深思。不久，这位章教授就被调走了。在送别会上，章教授热泪盈眶，不断用手帕擦眼泪。这时，同学们也

都哭了。这种情景，使松下学监大为不安，他赶紧即席“训话”，竭力冲淡这种气氛。此后，这个所就全部换成日本教师授课了。

六、“宽城子事件”

在1939年春的一个星期天，陈树满、陈作师、齐九皋和我四个人，一起到长春郊区宽城子去野游。其实，并不是光去野游。听人们讲宽城子是日军的设防要地，有飞机场、军事设施和军火仓库等等，戒备森严。我们商量用“学生野游”的名义，去看一看虚实，看看敌人在“首都”周围的军事部署究竟是啥样。我们信步而行，边走边看，可是，由于道路不熟，结果在不知不觉间，误入日本守备队的警戒区。当时，中国人一旦越过这个警戒区是可以格杀勿论的。日本哨兵发现我们走进警戒区，立刻端起刺刀，像野兽般地朝我们猛扑过来。他一边疯狂地喊叫着：“什么的干活？”“死啦死啦的！”一边用刺刀顶着我们的后腰，把我们押送到守备室。

在守备室里，一个值班的日本军曹，对我们更是怒目而视，杀气腾腾。他一再威吓说：

“你们的，不是好人！杀啦杀啦的有！”我们赶紧把身分证拿出来，说明误入禁地的原因。以后，虽然经过请示他的上级，决定放走我们，但这个军曹仍然余怒不息，在我们面前，他特地带上了一付白手套，然后用尽全身力量，狠狠地打了我们每人一个耳光。陈作师身体较单薄，这一个耳光几乎把他打倒在地。

在这次宽城子野游中，日本军的这“一掌之恨”，对我们刺激极大，是我们终身难忘的。这次，我们亲身体验到了国上沦亡民为奴的滋味，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和野蛮嘴脸。归途中，大家从内心里找出了一个共同的答案：不站起来和鬼子斗就没有活路！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在该所同学中最

先组织起反满抗日地下组织的核心力量，恰恰是这四个“宽城子事件”的当事者。国难身仇，终于使我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道路。

七、从思想酝酿到建立组织

在“宽城子事件”后，我们即开始在部分思想进步的同学中，酝酿建立秘密组织，准备在同学中更有组织的进行反满抗日思想启蒙活动。同时，由于第二期同学即将毕业，也迫切需要建立必要的组织联系，以便于在各地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活动。

在建立组织过程中，由于所方控制较严，为了稳妥，首先在极少数思想比较坚定的同学中，经过反复酝酿，初步建立了秘密核心小组。当时参加人员主要有：陈树满、陈作师（陈克）、徐连汉（徐明）、齐九皋、董存荣、王宪国、栾天英等人。

该小组确定当时任务大致是：①同旧书商建立联系，有计划引进一些进步书刊；②充实自己，影响周围同学，启发他们的爱国思想；③通过同学关系，建立一定联系，为日后发展组织做好准备。

当时第二期同学的思想状况，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日语程度较高，学习和工作卖力，受到日本人信任，毕业后准备“向上爬”，这部分同学被称为“高等官一路迈进派”，但在同学中是少数。二是学习不前不后，对日本人不即不离，对现状也有不满情绪，但为了“保住饭碗”，在思想上“随大流”，这是大多数，是属于中间派。三是思想倾向进步，憎恨日伪统治，有一定活动能力，在同学中影响较大，这也是少数，属于激进派。因此，我们尽量团结进步同学，形成活动核心，接触广大中间派同学，扩大影响，对少数“向上爬”的同学，也注意接近，遇机会“泼些冷水”，使他们头脑清醒点，正确认识自己的出路。

该小组建立还不到一个礼拜，就发现小组成员董春荣在与同学谈话中不谨慎，不能保守秘密，这种情况，引起其他成员极大不安。积极分子张士斌提出意见说：“这样下去，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拿着脑袋开玩笑！”陈作师说：“我们锻炼还不够，需要像达赖喇嘛面壁十年。”实际是针对董春荣说的。大家也考虑到：所中同学众多，稍有疏忽，即易暴露，会造成难以设想的后果。从长远考虑，最后确定暂时解散该小组。根据当时情况，实际上核心已经形成，即使没有组织，同样也可以进行工作，这反而更方便和更隐蔽一些。

虽然小组建立不到一个礼拜即宣告解散，但通过这次尝试，使我们也为日后进行更有组织的活动积累了经验。

八、赴日参观

1939年5月初，我们第二期全体同学在毕业的前夕，校方组织为期一个月的赴日参观团，由松下学监带队，全体师生一百六十余人。这次参观使我们从反面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也是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在抗日思想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这次参观中，我们旅行团几乎围绕整个日本走了一周。我们参观和游览的主要城市有下关、门司、八幡、东京、大阪、京都、横滨、横须贺、名古屋、神户、奈良和上野坊等大小城市，还有山区温泉和农村。

通过这次参观学习，使我们亲眼看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了支持日益扩大的侵华战争，在战时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动员方面已开始暴露出达到极限的困迫苗头，在日本各地到处都已呈现出日本人民物质生活的短缺现象和忧心忡忡的厌战情绪。大日本帝国这种外强中干的继续扩大战争的残喘局面，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庐山真面目”，在思想上彻底打破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

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坚持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信心和决心。

九、朝鲜人民的悲惨命运

从长春出发后，经过一天的旅程抵达我国边境城市安宁市（丹东）。当火车一开过鸭绿江大桥，我们旅行团即进入邻国朝鲜境内，这对我们大多数同学来说，都是第一次跨出国界。

到朝鲜境内，我们怀着一种新奇的心情眺望着沿途连续不断的朝鲜农村。我们看到的是贫困、落后和没有生气的惨淡景象。朝鲜农民的住宅，大都是低矮的小草房。农民出入好像不走门，而走窗户。大多数住宅没有院子，远远地望去，像一丛丛小蘑菇包聚居在一起。朝鲜人本来靠牛耕田，但我们一路上却没看到几头牛。在田间弯腰劳动的绝大部分是妇女，很少看到青壮男劳力。在朝鲜车站，看到大米包堆成小山待运日本。

在火车上，我们遇到一批朝鲜女学生旅行团。她们都穿着很整齐的学生服，白上衣，青裙子，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大部姿容秀丽，能歌善舞，充满着青春气息。我们用日语问：“你们是什么学校的学生？”当时日语已成为朝鲜“国语”，各机关、企业和学校都一律强行用日语讲话，连名字也改为日本的。

她们听到后，低头不语，不肯明确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学校的学生。经过慢慢地深入细谈，才使我们了解到她们是朝鲜艺伎学校的学生。这种学校是日本军方从朝鲜中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容貌秀丽的少女，然后送到艺伎学校再经过一年训练，即被送往正在国外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中，做随营妓女，供日本军蹂躏。

“这种学校在朝鲜别的地方还有吗？”

“可能还有，但对外不公开。”

“你们愿意进这种学校吗？”

她们含着眼泪回答说：“刚一入校时不知道，说是职业学校，工作有保障，待遇也好，可是一进来就出不去了。”

据了解，她们的家庭一般都很困难，生活没有出路。校方答应“毕业后统一分配，给以优厚待遇，要好好学习，报效国家”。

我们听到后，思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望着这些天真烂漫的朝鲜少女我们想，她们的前边有何等可怕的悲惨厄运在等待着她们呀？

沿途我们还看到一些建筑工地，很多朝鲜劳工在日本工头的监督下，在极其艰苦的劳动条件下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一个大桥工地上，我们看到一个朝鲜劳工刚在那儿站了一会，一个日本工头从后边跑过来，照着那个朝鲜劳工的后脑袋就是一镐，一下子就刨倒在地了。看到这一触目惊心的惨剧，使很多同学都感到极大震惊，在光天化日之下日本工头竟敢这样草菅人命而无所顾忌！在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民的悲惨命运，真是令人不堪设想！

到朝鲜首府汉城，我们参观和游览一天。参观了朝鲜历代王朝的皇宫，宫廷建筑样式和北京故宫相似，很多匾额和宫内的条幅，写的都是汉字和汉诗。这里充分反映了中朝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

但时代不同了，这里已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发号施令的都是日本人，而各种杂役和服务人员则都是朝鲜人，它是日本人统治和奴役朝鲜人民的鲜明特征。

在汉城国立公园和动物园里，我们看到很多朝鲜少女在樱花树下载歌载舞，边吃边笑，仿佛不知人间有忧愁事。这使人联想到在火车上遇到的女学生的命运，恐怕这些学生也在劫难逃吧！

这仅仅是我们在朝鲜看到的几个断片，但就是这些，就已足够地给我们上了一堂很深刻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实行残暴殖民统

治的政治课。这些情景，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十、李鸿章的乌纱帽和辱国史

我们旅行团由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金山市搭船去日本，经过对马海峡即登陆抵达日本下关。

在日本下关，我们旅行团参观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参观清朝外务大臣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来日本进行屈辱性外交的谈判室。这个谈判室有个名，叫“春帆楼”。室内很狭小，面积不超过20米。室内摆设都是按当时谈判的原样陈列的。室中间摆着一个长方形的谈判桌，桌子一头放着一把李鸿章坐的椅子，桌上放着李鸿章当时戴的插有花翎的乌纱帽，前边放着一支毛笔和砚台，对而是日方全权代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坐的椅子，也有笔墨和砚台。在对面墙上，挂着一幅署名日本少将写的七言律诗：

一战膺惩四百州，李爷到此直低头；千秋青史俨然在，……。

我们参观后，痛感这哪里象一个两国全权代表的谈判室，分明是一间特设的压李鸿章结“城下之盟”的逼降室和审问室。

据说，在谈判中，日方态度非常强硬，向李提出极其苛刻的条件和要求，并采取高压手段威逼李鸿章只能在“同意”或“不同意”之间表示态度。李在返回旅馆的途中，又被日本浪人小山六之助刺伤左颊。就是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李鸿章终于签订了中国历史上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松下学监把我们带到日本国土上，第一个就让我们看这样一个项目，他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继续向我们宣扬大日本帝国的“赫赫国威”和“不可战胜”，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历史上，大清帝国也只能是服服贴贴地听凭日本任意摆布和宰割。

但是，这位惯于实行威慑政策的松下学

监，在这里又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万万没有想到李鸿章的乌纱帽，日本少将的辱华诗……，对中国学生来说，它不可能起到别的作用，而只能更加激起同学们的民族义愤和敌忾情绪，使他们身临其境地受到了一次终身难忘的国耻历史的教育。

十一、“协和服”成了民族耻辱的标记

我们旅行团到东京时，停留三天。除有组织地参观外，还给较多自由活动时间，让同学们随便到街上买些东西，到处看看这个在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城市。

我们旅行团的同学，当时穿的是国防色毛哔叽“协和服”。这种服装类似现在的中山服，上身四个兜，兜中间有一道折缝。后背中间有一道横带，上下也有一道折缝。戴的是同日本军一样的战斗帽。在东北，这种服装到处皆是，因为它是伪满职员人人必穿的统一“官服”。但是，一到东京的大街上，这种服装就显得特别刺眼，就成为具有一种特别标记的服装了。很多日本人看到穿这种服装的同学们，不屑一顾，擦肩而过，甚至在打听道的时候，都不愿理睬，态度极其轻蔑。还有的日本浪人看到我们穿“协和服”的同学就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有的同学回答说：“我们是从满洲国来的。”他哈哈大笑，毫不忌讳地说：“什么满洲国，满蒙地区是大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日本皇军将征服全中国！”

这种难堪的遭遇，使同学们感到莫大耻辱，无地自容。这个日本浪人讲的却都是真话，他毫不留情地撕去了“满洲国”这块遮羞布，赤裸裸地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进行疯狂侵略的真实面目。

十二、日本军部的“死亡通知书”

我们在日本各地的参观中，最突出的一个感觉是日本军部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

它号令一切，主宰一切，它的铁腕伸向日本的各个角落，对日本全国人民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

在日本报纸上和广播里，每天每时都在宣传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赫赫战功”和日本军部“大本营”不可抗拒的命令，这种声音给日本人民特别是青年带来了巨大威胁和深重灾难。

在中小城市里，日本人民不象东京人那样歧视我们，我们可以心情舒畅地到处走走和看看了。每到傍晚，我们经常看到两个人架着一个醉汉走过街头。这些醉汉大都是青年，看样子，他们是借酒浇愁，借醉发疯。他们在街头，狂呼乱叫，手抓脚踢，仿佛要把眼前这个黑暗世界彻底抓碎。

我们向年纪较长些的日本人问：

“为什么醉酒青年这样多呀？”

他微微一笑地说：“他们心里闷得慌，借酒发疯！”

但为什么“心里闷得慌”，他就不往下再多说了。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反映日本青年对当时处境的苦闷和悲观情绪。日益扩大的侵华战争正象一个巨大的无底洞，每天都在大量消耗着有限的日本人力、物力和财力。日本大批青年正在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前线充当炮灰，在后方待征的日本青年，不知哪天就会接到日本军部的“征召令”，走上无去无回的死亡战场。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日本青年得喝且喝，得醉且醉，借酒发疯，以发泄对侵略战争的不满和绝望情绪。

在东京，我们还听到这样一个传说，有一家很有财产的富户，但独生子被日本军部征召入伍。母亲到军部提出请求说：她愿把家产拿出一半支援“圣战”，希望能为其独生子免除兵役。日本军部当即要她立下字据。而这位母亲回到家里时，她看到的是儿子的一具死尸。她儿子已被军部处决，死尸

被送到家中。这位独生子，的确是从此“永远被免除兵役”了。同时，这位惨遭无情打击痛不欲生的母亲，还不得不按照字据拿出家产的一半，去支援“大日本帝国”的所谓“圣战”。

这虽然是一个传闻，没有亲眼看到，但在当时日本军部法西斯残暴统治下，类似这样的惨剧，并不是不可能出现的。实际上当时日本人民的生命财产是没有任何保障的。特别是日本青年违抗或逃避兵役，或从战场上逃亡，就是死罪，是没有生存的余地的。这表明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部不仅是对中国人民，就是对日本人民也是什么令人发指的残暴行径都能干得出来的。

十三、白发人送黑发人

在日本各地参观中，我们还经常遇到送应征入伍青年的行列。在这一行列中，日本国防妇人会和应征入伍的家属和亲朋们，手里拿着日本小太阳旗，有乐队伴奏，吹吹打打，哭哭啼啼。冷眼一看，完全像一群送葬的队伍，哭声伴着乐曲，凄凄凉凉地向火车站走去。

有一次，在名古屋车站附近，我们仔细地观看了一个送应征入伍青年的仪式。在这里，我们丝毫看不到“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豪情壮志，更听不到亲人们的慷慨激昂的勉励之词。我们看到被送的应征青年，身上挎着红色带子，手里拿着鲜花，满眼泪痕，低头不语。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更是泣不成声。她拉着应征儿子的手，象是怕被人夺走似的久久不愿放开。在她身后，还有一位年青的少妇掩面而泣，动人心弦。站在周围的亲朋们，也都在擦眼泪……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真是一幕活生生的灾难深重的日本人生离死别的悲剧。老同学陈作师触景生情，当即写诗一首：

举国阴气森，站站出征人；

今夕送人者，明朝被送人。

我们看到这些情景，深深感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是极其不得人心的，它是强加在日本人民头上的。因此在日本基本群众中，到处弥漫着反战和厌战情绪，这是毫不奇怪的。

很多迹象表明，日本应征青年的人力资源，也并不是取之不尽的。尤其在中、小城市里，日本人力资源面临枯竭的迹象特别醒目。我们看到，到处都是日本妇女们在忙忙碌碌，走到街上几乎已成“妇女世界”。机关、企业、学校、医院、商店和各种服务行业，大部由妇女担负起来，男性青年寥寥可数。

在日本农村中，我们还看到很多农舍房顶上，插着小黑旗。据了解，这是该户农民家有应征入伍青年阵亡的标记。每户阵亡家属并以此为据，取得日本政府的“特别待遇”。后来听说，由于侵华前线阵亡人数越来越多，如果日本很多居民房上都插黑旗，这对国民士气怕产生不利影响，于是日本军部又勒令取消了这种标记。

十四、海外华侨的忧国之情

我们在东京、大阪等大、中城市里，总喜欢到华侨饭店里换换口味，吃点家乡饭。但是，在这些城市里的华侨饭店大多是广东人或四川人，饭菜味道都不太适合东北人的口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到那里吃一顿晚餐，尝一尝异国的家乡饭。

华侨饭店经理看到我们是来自中国的学生，所以分外热情。饭菜让我们随便吃随便添，而且要很少的钱，有时就不要钱了。饭店经理和家属还坐在我们的桌旁，关心打听东北人民生活和日本人在那里的情况，忧念祖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有的移居日本已经一两代了，但离祖国的时间越长，他们思念祖国之情就越深，不管走到哪里，炎黄子孙

总是连心的。

在山田市饭店，我们少数同学遇到一位开理发铺的华侨叫周家惠，看到我们是来自祖国的学生，倍感亲切。他请我们喝酒，并透露他的大儿子现正在祖国参加抗日战争，他的小儿子也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最后还把他在神户的住址告诉我们。我们认为这位爱国华侨一定是抗日的，想同他建立一定联系。我们到神户特地去访问时，他表现却很谨慎，并说“那天喝多了，什么也没谈。”我们事后分析，这种情绪变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当时日本法西斯军部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一句话不慎，就可能引起杀身之祸，而且，我们和这位华侨也只是在海外萍水相逢，相互并不完全了解。

在东京，陈作师、陈树满和西丰县留学日本东京商师的同学赵兴权会面，他给他们看几张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小报，还介绍了日本农民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情况。有的农民被逼卖女沦娼以交纳地租。在京都大堰川（桃山御陵下）看到日本有产阶级的青年男女双双泛舟，不知人间有忧虑事。陈作师曾浮想联翩留诗一首：“出征掠地却为谁，逼得妻孥作物围（注）；战场涓涓流碧血，大堰双双泛舟来。”

（注：日语原文为“物围”，含意如我们所说的“外室”。此处为考虑字面而颠倒写成“物围”。）

十五、神田町书店的宝贵收获

在东京，我们最感兴趣的 是神田町书店。这些书店户连栉比，几乎占了整个街道，有的还陈列和出售各种来自中国的书刊。在当时我们看不到的禁阅书刊，在这里也能找到一些，甚至介绍中国大后方抗日情况的书刊和社会科学马列主义著作，这儿也有。

乍一看到，我们很奇怪：在“大日本帝国战时体制”下，到处都是清一色的宣传

“举国动员”、“总体战争”、“皇军必胜”等书刊，在这里竟会出现这样一块“世外桃源”，公开出售这种绝对严禁的进步书刊，传播另外一种反法西斯的信息，日本军部为什么不勒令禁止呢？在这里是否有日本密探在暗中监视或者利用这些书刊来引人上钩？

我们对此，不能不提高警惕。我们仔细观察了周围的情况，除了有少数日本学生在阅读外，并没有发现什么行迹可疑的人。书店老板也很热情，欢迎我们选购各种书刊，他根本不注意我们买那种性质的书。于是，很多同学都放心大胆地选购了自己所喜欢的书刊，我们志同道合的部分同学，更不例外。在这里，我们选购了大批抗日书刊，进步文学作品，社会科学和一部分马列主义著作。这些书刊，在后来已成为我们进行反满抗日活动时传阅书刊的一部分。

最后，该感谢松下学监，他为了照顾同学们携带物品方便，由所方负责打成十几个大木箱子，向国内邮寄。还得感谢日本海关，他们为照顾我们是“同行”没有进行任何检查，就全部准许寄出。同时，还在日本海关的大厅里，举行了欢送我们全体旅行团的便宴，祝我们一路顺风！

十六、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大多数日本人民，对我们是热情友好的。在很多地方，我们受到盛情款待，问寒问暖；在参观游览中，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方便；在宿泊时，日本服务人员端茶送饭，叠床铺被，殷勤问候。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火车上，很多日本旅客都喜欢和我们促膝交谈。他们打听我们家乡各种风土人情和生活情况。他们也很关心在那里的日本人表现怎样，是否受当地人欢迎。有的日本旅客还表示着希望，说：“他们是客人，应该回

你们友好相处。”这种良好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可能还不太清楚他们在那里的同胞早已不是客人，而是发号施令的主人了！

在旅途上，我还遇到一位对中国古典文学很有研究的日本老先生。他热情地赞扬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日本古代文化很多是从中国传来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对世界文化发展都有很大贡献。”他还即席背诵了一首中国的七言律诗：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然后，他不胜感慨地说：“打仗对两国都没有好处，应该早结束这场战争，中日两国应该和平友好的相处。”

当时，在日本能够把我们看成是中国人，而且讲这样的肺腑之言的人是不多的。

同时，我也隐约地觉察到，莫不是这位日本老先生也有亲人在侵华战争的前线作战？这场战争如果不结束，恐怕也难以生还了！

十七、两个立场，两种收获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旅行团围绕日本走了一周，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

在这次紧张的参观活动中，我们从城市到农村，从各个不同角度接触和探索了这个对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切肤关系的国家。在归途上，我们一部分同学相互漫谈了这次赴日参观的感想和收获。总的说来，大致归纳为这样几点：

①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是完全违背日本人民的意愿的。日本青年是在高压政策下被迫到异国作战，因而认为“皇军不可战胜”是没有根据的。

②日本国土狭小，资源不足，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很有限，很难支持这场长期的侵华战争。

③只要我们回国后在东北人民中间开展思想工作，坚持反满抗日的艰苦斗争，最后总有一天是能够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我们应该树立这种信心和决心。

另一方面，松下学监也认为这次赴日参观取得了重大思想成果，他感到非常满意。在这次访日途中，他为了使我们更多的受到一些“教育”，每到一个地方，他尽量让我们多看一些工厂和单位，以显示日本经济的高度和强大威力；每遇到天皇庙宇和神社，他必领我们去进行虔诚的团拜，以使我们“日本亲邦”更加“忠诚”和“热爱”。

在横须贺军港参观时，松下学监还特地把我们领到当地驻军师团司令部，去接受他过去老上级师团长的亲自检阅和训话。这位师团长对我们这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准军事体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最后还招待我们吃一顿午餐。这使松下学监很是受宠若惊，感到无上光荣。

十八、陈作师的临别赠言

参观任务结束后，我们由神户乘船经过三天航程抵达大连。

到大连后，松下学监为了祝贺这次完成赴日学习任务 and 欢送同学们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特在大连饭店七楼大厅举行宴会。松下学监频频举杯慰劳大家，一再鼓励我们：“不要辜负这次赴日之行，今后一定要在满洲国的财税战线上，做光辉榜样！”

在宴会上，同学们由于朝夕相处，即将分别，思绪万千，心情十分激动。特别是在几次干杯之后，更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这时，陈作师这位沉着勇敢的老同学，突然站起来，他慷慨激昂地向全体同学们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临别赠言，使同学们很受震动。

他开头讲：“去年春天我提着提包，来到南岭，曾几何时，又很快将要提着提包，离

开南岭。一年半的时间是这样匆匆，在这匆匆之中我学到了什么呢？我只感到做人之道，必须正直，正直！要正大光明地做人，要光明磊落地做人，决不能胁肩谄笑，妩媚求荣……”

他声音更加激昂地讲：“我们这次到日本参观了一个月，我们一定要不虚此行，要认真学习日本人的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做为一个青年，我们要勇猛前进，敢于闯新路。

前边本来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只有不断开荒斩草，才能开辟我们前进的道路……”

陈作师的临别赠言，不断得到同学们的热烈掌声。松下学监也不得不随着大家一起鼓掌。这篇赠言，从表面上听，不外是鼓励同学们要奋发有为，注意立世修身之道，但在实际上却是一篇震耳发聩的宣言书，它鼓励同学们要勇敢地行动起来，走民族救亡的道路，不要甘心为敌人做牛马！但是，这个潜台词，当时正完全陶醉在胜利凯旋声中的松下学监，却被轻轻地放过了！

十九、信誓旦旦，后会有期

我们回到长春即举行毕业典礼，然后，由伪满经济部统一向东北各地区分配。在分配时，尽量照顾每个人的家乡所在地区。我家住在突泉县，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市，陈树满被分配到吉林，后转到长春，陈作师被分配到吉林，齐九皋被分配到锦州，董春荣被分配到哈尔滨市。

在临别前夕，我们部分同学频频集会，交谈思想和今后打算，一致相约在奔赴各地后，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按既定的政治方向，继续充实和提高自己，发展和扩大力量，待一旦条件成熟时，即进一步建立组织，把反满抗日斗争坚持到底。我们信誓旦旦地握手告别，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迎接即

将到来的空前严峻的反满抗日斗争的风暴！

这一历史情况，在日伪档案中也有所记载：“徐连汉（徐明）在财务训练所学习时，由于受到陈树满的宣传与感化而终于具有了左翼的反满抗日思想。在训练所毕业时，又受到陈的如下鼓励：各自到任地上任以后，也要继续进行读书研究，以保持原来的思想，同时要发展同志，并对之进行启蒙。”

实际上并不是我接受哪个人的所谓“宣传与感化”，而是我们在共同阅读进步书刊和患难与共的社会遭遇中，逐步提高了热爱祖国和追求进步的思想觉悟，因而把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坚持走反满抗日的救亡道路。老同学陈作师到吉林后曾写有一首诗，反映了我们在这一时期热血澎湃的激荡的思想情绪。其内容是：

灯红酒绿近江楼，泪洒江干话同仇；
午夜狼嘶归醉汉，饿殍载途绞心头。
十载寒窗空自愧，一腔热血待时流；
双亲不老恩常在，愿舍田园任去留。

二十、端午节和中秋节的新京集会

1940年旧历端午节，在新京举行第一次集会，地址是在伪“新京税捐局”。参加这次集会的人员有陈树满、陈作师（陈克）齐九皋、徐连汉、董春荣、李逢春（李康）、刘庆武、李金山（李季若）、刘荣久、刘长春（刘丹华）、王国贤、王宪国、唐先武、张东人、高述文等十五人。

在这次会上，我们正式建立了东北爱国青年反满抗日的秘密组织。经过讨论，确定了这个组织的目的纲领、信条和工作方法等问题。其中目的规定：①我们要活着；②我们要继续活着；③我们要继续好好地活着。纲领确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阀和财阀，解放全东北。工作方法规定：①读书充实自己；②交友——推动别人（发展和扩大组

织)。

从目的和纲领中,可以看出这个组织的中心思想,就是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和占领,为民族生存而斗争。还可以看出这个组织是一个很民主的群众性组织,没有最高负责人,参加成员都以各次集会制定的决议和任务,做为自己的行动依据。另外,虽然有了组织活动但没有确定正式名称。当时大家认为,由于是一个跨地区组织,活动面广,成员较多,一旦定名,经过相互传播而极易暴露,最后决定不定名称。日伪当局后来根据该组织地区分布、政治倾向和活动特点,定名为“全满读书会”或“左翼读书会”。显然我们自己是不会起这样名字的。

同年中秋节,第二次在新京集会。这次集会除原有成员外,又有很多新人参加,主要有赵景儒、王德林、王振亚、高德生(高也平)、贾乃庭(于岩)、张德林(高方)等。这次集会着重就对外关系和今后出路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主要确定:在对外关系方面,除个人接触外,不向任何组织发生关系;由思想启蒙转向实际行动,有效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掌握武装力量,向抗联方面靠近,向伪军方面发展。

同时,在新京建立了秘密藏书库,由李逢春负责。在经费方面,决定开辟新的财源,除个人捐赠外,与中国商人结合,实行偷、漏税,既获得了经费,又破坏了敌伪财政收入。但也因此埋下了日后意想不到的祸根。那就是1941年8月,王国贤因“贪污税款”事发,日伪特务搜查时,在王家发现很多秘密材料,使王由经济案件转为政治案件,引起了敌人的高度注意,为该组织的最后暴露留下了一个隐患。

二十一、建立齐市核心小组

1940年6月,常吉和左连贵(左念吾)

由“新京财务职员养成所”第三期毕业,被公配到齐市工作。常吉的家是齐市的老户,左连贵的原籍是黑龙江省绥化县。

常吉回齐时,带有陈树满给我的介绍信。介绍说,常、左二人思想都比较进步,政治可靠,可以做为发展组织的可靠力量。常、左二人当时都在二十岁左右。常表现积极热情,朝气蓬勃,遇事反映敏锐,有敢闯敢干精神。左态度沉着冷静,性格刚毅,遇事深思熟虑,不轻易草率决定,作风严谨,不露锋芒。常、左二人的回齐,极大地增强了我在齐市开展活动的信心和力量,彻底摆脱了孤军奋战的局面。

常吉刚一回到齐市就到我家拜访。我们俩利用一个星期天,去齐市郊区浏园做竟日游。在这次谈话中,常毫无保留地向我讲述了他对目前局势、民族地位、政治方向和今后活动要求的看法。从常的谈话中,使我进一步了解到常不仅对当前反满抗日斗争立场比较坚定,而且在政治思想倾向上,追求进步,向往共产党。左是常的老同学,多年来他们朝夕相处,思想观点都是息息相通,完全一致的。这种情况,就奠定了我们在齐市一同开展活动的巩固的思想基础。

不久,我会同常、左、赵在我家,正式讨论和建立了齐市反满抗日的地下核心小组。我根据端午节的决议,确定我们核心小组的首要任务,仍然是通过“读书交友”,进行热爱祖国和反满抗日的启蒙传教育,进一步充实自己、发展别人和扩大组织,逐步使齐市成为在北满地区开展地下活动的一个中心。

在这以后开展的活动中,对所接触的青年在进行启蒙教育时,我们逐步形成了一套宣传用语——用隐晦性的双关语来代替特定的政治内容。例如,用“充实自己”代替“提高自己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用“推动别人”代替“帮助别人提高爱国主义思想觉悟”,用“认清现实”代替“由于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要认清东北人民已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用“青年人要认清自己，有所作为”代替“东北青年要认清自己的神圣职责，勇敢地行动起来，进行反满抗日的斗争”，用“要有为大我而牺牲小我的精神”代替“在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要有高度自我牺牲的精神”，用“不要为虎作伥”代替“不要为日本侵略者做忠实爪牙”……等等。

这些隐晦性的语言，对于有一定政治觉悟的青年来说，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从中获得教益；对于别有用心的人，虽然听了去，但可以解释鼓励青年奋发有为，使其抓不住任何政治把柄。

二十二、中兴街的日本书店

在紧张的传阅书刊活动中，大家对书刊的来源表示了高度的关注。在齐齐哈尔市，我们当时书刊的来源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齐市核心小组在赵善培家设立地下藏书库，储存了一大部份文艺和社会科学等方面书刊，随时供应需要；二是由长春组织定期或不定期供应一定数量的新到书刊，各地巡回传阅；三是就地取材，从日本书店开辟新的书刊来源。

这第三条渠道的书刊在当时是大量供应，公开出售，使之没有风险。由于我们小组要加强对国际形势和抗日战争形势的了解和研究，因而大力开辟第三条书刊渠道，就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当时，在齐市中兴街有一处日文书店，我几乎每到星期日，就要到该书店浏览一遍。经过一个时期的了解，我发现在日文书刊中，也并不是全部实行严密封锁和用一个腔调讲话的。有些书刊对当时整个国际形势和抗日战争形势都不断有各样不同观点的报道，这对于我们及时了解敌我斗争的形势是很有帮助的。比如从《时局情报》这本月刊里可以了解当时德

日意轴心国和同盟国两个阵营的整个战略形势发展和各个局部战场形势的变化，这是我们分析国际形势的一本主要刊物，对重要材料我做了翻译和摘录，并向小组做了介绍。月刊《露西亚》，每期对苏联政治经济和苏德战争的情况，从不同角度进行详细的介绍，这对我们了解苏联卫国战争情况很有帮助。我们当时很欣赏《大陆》杂志，这本刊物，它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各方面情况，都有及时而全面的报道，对敌后游击战争和解放区建设情况有时也进行较为客观的介绍。我们从该刊中曾看到陈学昭写的《访问延安》和《访问延安抗日大学》的翻译文章。也可能由于这个缘故，该刊以后被迫停刊了。

此外，我们还发现这个书店有介绍抗日战争的书籍，如《中国的战时体制》、《日本对华总体战争》、《中共的游击战争》、《中国农村新动向》、《华北的治安和防共对策》等等。特别是《中国农村新动向》一书，是日本进步作家尾崎秀实译著，它的内容是全部翻译当时《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有关解放区农村建设、租佃关系、减租减息和统一战线政策等问题的文章，而且全部内容都如实照译，只对文章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句话，打成八个×。这本书对我们帮助极大，对敌后解放区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在那次买书归家途中，当我走到旧城南门外时，突然遇到两个便衣警察，对我实行突检。他们把这本书草草翻阅一下，看是一本日文书，又马上交还给我，并表示歉意地说：“对不起！由于一位日本人在车站丢失一个皮包，内有重要文件，所以实行全市大检查。”我这时才把心放了下来。

二十三、难得的理论启蒙良师

1940年春，我突然接到一封来自“新京财务职员养成所”的来信，署名是鞠××

名字忘记)，信中说，他原是伪龙江税务监督署征收股长（高等官试补），现在该所进行短期训练，不久即将回来。在信中他开门见山地讲：“经陈树满的的介绍，我们都是属于〇〇战线的，我们的思想是相通的，我学习回来后，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前进！”

在当时那种敌探密布的险恶环境下，在信中竟使用这样坦率的语言，使我大吃一惊。我担心这封信一旦被敌人检查，仅这“〇〇战线”一句话，就足够把我们抓进监狱了。这“〇〇战线”究竟是什么战线？实在是使人有口难分诉！我仔细地检查了一下信皮，没有发现被拆封的痕迹，于是我马上就把这封信焚毁了。

我怀着满腹疑虑等待着这位上级的归来。不久，鞠股长从长春回来了，他约会我到他家串门。他家住在齐市旧城南门外，院落很清静，杂人很少。见面后，我发觉他并不是像信中所表示的那种锋芒外露的人。他是南方人，中矮身材，言谈稳健，态度也很沉着，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我的心情开始稳定下来了，再也未提“〇〇战线”那件事。

同鞠股长的接触，使我意外地发现了他那些对我终生都有深刻思想影响的藏书，使我遇到了难得的良师益友。在他家里，藏有在当时很难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书籍，他逐本借给我阅读，并一再嘱咐说：“这些书，只借给你秘密阅读，不要让别人发觉，更不能转借给任何人。有疑难问题，我们可以共同研究。”

这些书中，沈志远著《经济学大纲》使我收获最大。这本书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理论做了系统而通俗的阐述。我过去是学财政经济和税务法律的，从没有接触过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借到这本书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了近一个月。每天夜静更深时，我便埋头在这本闪耀着科学真理的厚本

上。从这理，使我了解到商品构成、劳动创造价值、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总危机以及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等基本理论。它扩大了我的视野，使我进一步看清了政治方向和前进道路。它更使我深切体会到：在青年时代的斗争生活中，如果说还有什么最大幸福的话，那就是“深夜闭门读禁书”了！

在当时，我不能做读书笔记，又不能向外转借，我必须把书中的主要内容都牢牢地记下来，以便向我的战友们进行口头传播。遇有理解不透的问题，我就到鞠老师家请教。他对人循循善诱，阐述问题条理分明，逻辑严谨，很有说服力量。有一次他对我说：“这本书所介绍的内容，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我是坚信不疑的，我们应很好学习和研究。”还向我说：“每个社会或迟或早都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帝国主义为摆脱危机，想从战争中寻找出路，但战争只会给它们带来灭亡！我们对此应该抱有信心。”夜静更深，和鞠老师隔桌对坐，他把重大理论问题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向我侃侃而谈，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还有一位值得一叙的人物，是鞠大嫂。鞠老师没有孩子，我每到他家鞠大嫂就躲到别屋去，从不插言。鞠老师经常留我在他家吃饭，鞠大嫂把菜饭摆好后，就又躲开，从不同桌吃饭，我感到很不过意。我深深感谢这位老大嫂给我创造了向鞠老师请教的环境和条件。

解放后，我一直没有听到鞠老师的任何消息，但我永远要感谢这位在理论和思想方面对我进行启蒙教育的老师，正是他在我青年时代最关键的时刻指明了我的前进方向！

二十四、调查日寇罪行的同路人

1940年春，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还结识了一位在伪龙江省公署的刘事务官。他是